

#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的 学科化建构\*

缪德刚

**摘要：**18世纪末，经济学在欧洲地区发展成为系统化的经济科学，而此时的中国经济思想仍然处于前科学阶段。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传统生产方式与思想文化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随着外来学术思想的传播，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参照欧美地区的经济科学从中国思想文化中解构出经济思想，奠定了中国经济思想学科化发展的基础。这些尝试或许是初步的，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的经济科学化推动了经济学研究的本土化发展，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早期发展的一个缩影。探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的经济学学科化构建问题，可以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提供有助益的启示。

**关键词：**传统经济思想 经济学说 中国经济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外国经济学说在近代传入中国，中国经济思想开始融入外来要素（胡寄窗，1988：2）。中国经济思想因此而衍生为两条发展线索：一是外来经济学说在被借鉴于解释中国社会经济现象过程中逐渐本土化；二是通过吸收、借鉴外来经济学说中的理论要素，一些学者试图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解构出

---

〔作者简介〕缪德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836、102488，电子信箱：ndg2016@126.com。

\* 在本文作者主讲的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2021年秋季学期邀请学者报告会上，虞云国、杜斗成、李天纲、陈少明、李兰芬、曹家齐、苏杰、刘永华、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赵灿鹏、姜文涛、张浩、张国旺、於梅舫、张涛、武琼芳，以及邓小南、渠敬东、韩笑、周建波、张亚光、刘群艺等学者参与了讨论，他们除了对本文所涉内容给予评论、指正之外，着重对深化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建议。作者谨此向以上诸位师友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意见。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计划“中国经济思想史特殊学科”阶段性成果，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请学者”项目助成。

能与国外经济思想相互观照的中国经济思想。其中，原本已经学科化<sup>①</sup>的外来经济学本土化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演进的主流，绝大多数既有研究也是围绕该领域的相关议题展开的（杨春学，2019；程霖、张申、陈旭东，2018；邹进文，2010）。与之相较而言，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经济学学科化构建问题则被学界长期忽视。除叶坦（2003）和赵靖、张鸿翼、郑学益（1984）在学术史回顾中梳理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在近代的发展情况之外，鲜有著述从学理角度予以专门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在数千年社会经济延续过程中形成的具有自身文化特性的经济思想，它可以参照外来经济科学予以整理与诠释，说明了二者存在兼容性，从而奠定了经济科学在中国本土化发展的学理基础。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创立是以近代学界对传统经济思想的科学化构建为肇始的。如今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地区经济学学科门类中的子学科，反思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学术中的变迁，可以为当前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一些启示。

## 一、本因：18世纪后期中、欧经济思想的范式分野<sup>②</sup>

18世纪的欧洲经济思想已经呈现出理论架构及分析方法系统化或科学化的发展情势，这一点被部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研究者所关注和讨论，如甘乃

---

① 在近代著作中，常用“科学化”描述经济学的学科化发展，但“科学化”与“学科化”二者涵义并不完全相同，前者侧重过程，后者偏重结果。具体到本文来说，近代学者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借助欧美经济学说中已经“学科化”的“科学”元素将经济思想从思想文化中爬梳、整理出来。因此，“科学化”是过程，其结果形成了“学科化”是发展趋势。不过，为了避免二者可能造成的混乱，本文主要使用“学科化”一词。

② 按照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的科学分类方法，没有形成范式的理论处于前科学（prescience）阶段。借助库恩的“范式”概念不单可以把“经济科学”与“前科学”的经济思想进行简单明了的区分，更为重要的是也能够说明18世纪末以后中、欧经济思想演进趋向的分野。但“范式”概念也可能会造成一些对经济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比如忽视处于“前科学”阶段的经济思想的多样性，将“前科学”阶段的经济思想等同于“无价值”的经济思想，等等。所以，“范式”概念更适合对“前科学”阶段的经济思想进行“解构”或“分析”，而不宜据此对其“评判”。另外，笔者强调，“科学化”是18世纪末以后经济学演进的一条主要路径，但不是唯一路径。运用库恩“范式”理念分析中国经济思想阶段特点的成果可参见赵晓雷（2005）、熊金武（2020）。

光曾用“science”一词来表述经济学的系统化（甘乃光，1920）。<sup>①</sup>“科学化”仅是针对经济思想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进行的划分，并不否认“前科学化”的经济思想具有的科学成分，也不否认欧美地区之外的地区经济思想中含有科学性要素。事实上，19世纪中期以前，东、西方皆产生过经济思想，不同地区的经济思想之间还具备一些相通的特点。以古代中国、希腊、罗马经济思想为例，它们重视农业生产，而对工商业持保留态度，在商品交换、货币、市场、价格等方面都有相关论述（巫宝三，1982）。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初步界定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与分析方法，一些中国近代学者认为，该书的问世标志着经济思想在欧洲地区发展成为了系统化的经济科学。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者较为一致的认识是，以《国富论》为分水岭，欧美经济思想分为有系统或科学化、未成系统或前科学阶段的学说。尽管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包含大量经济思想，但未能像欧美经济思想那样在18世纪末以前发展为经济科学（唐庆增，1935；孔庆宗，1921；王海波，1932）。

### （一）前科学阶段的中、欧经济思想演进

经济思想是现实经济生活在意识上的反映，在人类没有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之前，经济现象就早已存在了。在中国近代通行的外国经济思想史著作中，古希腊经济思想及欧洲中世纪经院学者的经济思想是15世纪末以前经济思想的主体部分。古希腊经济思想至少可以追溯至公元前6世纪，后来古希腊有代表性的经济思想被罗马帝国所继承。古希腊、罗马的社会经济建立在奴隶制度上，其经济思想关注过财富、价值、效用等问题，但并未深入。在古希腊、罗马经济最繁盛之时，也有关于财富、分工、货币问题的讨论。较之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经济思想，古希腊的经济思想注重分析个人经济行为，初步使用了历史分析方法，罗马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在于制度方面（韩讷，1926：66—67、80—82）。

中国的经济传说可以追溯至公元前30世纪，这些经济传说主要集中于农业领域。西周时期的经济思想重视农业生产，对商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也

① 甘乃光的这种经济思想史的划分阶段与科学哲学在理念上有相近之处。甘乃光对未科学化、科学化经济思想的区分应该是受到了韩讷（Lewis H. Haney）的影响。

有一定的认识。春秋时期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义利”“轻重”“黜奢崇俭”之类的观念、范式或原理已经出现。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兼并战争不断，各国实施变法改革，秉持不同主张的学派陆续形成并互相争鸣、抨击，各学派又衍生出不同的流派，他们的经济主张包含了丰富的经济思想。秦汉时期儒家开始吸收其他学派的观点巩固自身文化地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逐渐保守。汉元帝时期，重本抑末、贵义贱利、黜奢崇俭等成为封建正统经济思想（赵靖，2002：673—681）。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到清代中期，各朝代基本上采用同样的传统思想文化维持国家社会经济秩序。正因如此，尽管个别时期会出现少量非正统、反传统的经济思想，但中国经济思想的主流是继承此前的封建正统经济思想。当代少数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者认识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具有的科学性，甚至认为先秦时期的部分著述可以媲美欧美早期的经济科学典籍（兰德雷斯、柯南德尔，2014：30—32）。但近代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者的主流观点是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视为社会改造的伦理教条。<sup>①</sup>

欧洲在中世纪发生的社会经济变化几乎皆与宗教活动有关联，相应的经济观念也带有宗教伦理特征。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社会文化停滞之后，欧洲经济思想在11世纪随着农业和商业发展更新起来。古希腊的一些著作通过叙利亚语、阿拉伯语译为拉丁语并传入西欧，各类异端思想兴起。为了维护基督教信仰，经院学者利用辩证方法阐述其观点。经院哲学旨在确定宗教标准，借此评判经济行为。直至16—17世纪经院哲学依然存在，尽管宗教学说与经济活动相左，但该时期的经院哲学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经济解释，奠定了后来经济学的分析基础。

15世纪的欧洲社会，贸易活动日渐发达，经济思想也在零零碎碎地进化。15世纪末，工商业的兴起、美洲金银矿的发现、民族国家的形成等因素孕育了重商思想。由于西欧各国由都市经济发展到了国家经济，贵金属货币成为国家富强的标志性要件（李炳焕，1934）。因此，重商主义者关心民族国家的经济，注重海外贸易和贵金属货币的累积，为了获取他们所认定的财富，他们主张政府实行经济干预政策。尽管重商主义学说很少有抽象的理论分析，但重商主义学说摆脱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束缚，是近代经济科学的先

<sup>①</sup> 如塞利格曼（1934）。

驱（胡寄窗，1988：475—480）。18世纪中期重商主义政策对法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负面的影响，重农主义由此兴起。重农主义者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形成实际的生产盈余，他们大多相信存在独立于人类意志而支配着社会经济运行的自然秩序法则，人类可以客观地探寻到自然秩序法则。因此，重农主义者主张对经济思想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整理、分析，从而使得经济思想系统化。

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欧洲地区的经济思想几乎是相对独立发展起来的，二者都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停滞，但16—17世纪日益发达的工商业贸易推动了欧洲地区经济思想的革新。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政治学、哲学、科学的繁荣为经济思想在欧洲地区的科学化发展奠定了基础。重商主义、重农学派不仅将经济问题分析范围扩大到整个社会经济系统，而且其主张的分析方法也有一定的科学性。让·博丹（Jean Bodin）、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约翰·洛克（John Locke）、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亚伯拉罕·塔克（Abraham Tucker）、大卫·休谟（David Hume）等人的思想直接被古典经济学吸收。反观中国，即使是在封建正统经济思想形成后，经济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中也不占主要位置，它不仅没有与其他思想文化分离，也未能从前人的价值观念中独立（王海波，1932）。限于社会生产方式以及自身浓厚的世俗伦理特征，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常见于采取规范方法分析现实世界局部的经济现象，直到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科学化进程上未发生重大突破。

## （二）20世纪中期以前经济科学在欧美地区的发展

18世纪中期，英国开始发生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改变了以往的道德观念。<sup>①</sup>为了适应工业革命逐渐带来的生活方式变化，一些思想家开始思考全社会所应该遵守的新行为规则，即“道德哲学”。在此背景下，关注市民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逐渐形成体系。随着社会的商业化程度提高，斯密的道德哲学

<sup>①</sup> 具有道德观念色彩原本是中世纪及其之前经济思想的特征，在出版《国富论》之前，斯密曾于1759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论》。有观点认为，《国富论》的出版显然意味着斯密个人思想体系发生了改变，而这个改变成为了经济思想科学化发展的重要分界线（李森林，1935）。

将政治与经济生活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斯密的道德哲学不仅考虑了社会结构及运作机理、政治与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还关心如何获得生活资料，以及怎样才能生产、分配、流通等经济问题（朱绍文，2010）。建构在工厂制度基础上的分工问题是当时学者的研究关注点之一，《国富论》即是由分工学说出发，论及社会经济诸多领域问题的。

《国富论》出版之前，几乎没有哪一位经济问题探讨者将经院哲学、重商主义、重农主义等的理论贡献综合为一个体系。在《国富论》中，斯密继承了重商主义关于经济学研究范围的认识，而他作为自由放任理念的拥趸显然受到了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事实上，斯密并不认为市场是完美的，他赞同政府在一些经济领域的行政干预，但在当时的历史与制度结构下，市场秩序比重商主义主张的政策干预能产生更好的经济结果。《国富论》综合了当时欧洲流行的经济学说，不仅初步界定了经济学的基本研究范围，而且较为系统地使用了历史归纳、抽象演绎等研究方法。《国富论》奠定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因此被视为第一部经济科学著作（唐庆增，1933）。

18世纪中叶后的百余年里，经济学者对《国富论》的理论体系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解读，参考其研究方法分析社会经济问题，并对《国富论》的矛盾之处进行修正。19世纪前期，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从国民财富增长问题扩展到收入分配问题，他在抽象推理方法的运用方面较此前的分析方法有了明显突破，这对经济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李嘉图之后，古典经济学重视价值论、分配论，较少论及生产论和消费论，注重抽象方法的使用和普遍理论的演绎。随着抽象化程度的提高，古典经济学理论越来越难以解释经济生活中的特殊经济现象，因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张素民，1934）。1848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sup>①</sup>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该书集古典经济学之大成，区分了生产法则与分配法则，并对当时对古典经济学的抨击均有相当的解答。约翰·穆勒强调经济学的理论演绎，但同样倡导注重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契合。尽管如此，约翰·穆勒之后，古典经济学还是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sup>①</sup> 本文以下简称约翰·穆勒时特指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以和后文中的詹姆斯·穆勒相区别。

《国富论》问世不久便流传到了欧洲大陆。19世纪初，以斯密自由贸易理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在德国北部的港口城市十分盛行。由于德意志严重分裂、工商业欠发达，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要位置，英国的廉价工业品输入到德国之后，使得德国民族工业遭遇重创。当时古典经济学的抽象化发展，不能很好地解释德国面临的社会经济现实问题。德国学者摒弃抽象的经济学理论，重视历史观念及真实世界的经济问题，他们通过统计数据的社会经济问题，扩展了经济学研究范围与方法。受历史学派影响，经济学者更加注重经济史问题的研究。在19世纪后期，由历史学派引发的研究思潮一度震荡西欧（萧伟信，1932），并吸引了一批美国学生赴德学习。然而，由于德国历史学派对一般化的经济学理论持排斥态度，以致束缚了自身的发展（甘乃光，1920）。19世纪80年代，奥地利学派反对德国历史学派否定抽象演绎的方法，致使二者发生了关于经济学方法的论战，这场论战延续至20世纪初。德奥方法论之争后，德国历史学派归于沉寂（魏建，1999）。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大机器设备的使用形成了工厂制度，家庭手工制度逐渐崩溃。19世纪前期，英国连续发生经济危机，造成了生产下降，大量工人失业。随着资本的集中和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劳动阶级的数量不断增多，经济危机带来的生活状况恶化使得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之间的摩擦日益增大。身处贫困的劳动阶级发出反抗的呼声，社会主义学说风靡一时。社会主义学说可以追溯至16世纪且后来形成了很多流派，流行于19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对约翰·穆勒的经济学说产生了影响。社会主义学说诸流派中，影响最大的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19世纪末期，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广为人知。马克思从古典经济学尤其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中汲取了理论要素，并融入了哲学分析与阶级分析，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超越了纯粹的经济学范畴。

19世纪后期，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标志着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转变。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莱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是边际效用学派中齐名的三位代表人物，后来秉持边际效用分析方法的经济学者衍生出一些流派。奥地利学派是边际效用学派的流派之一，奥地利学派赞成经济学主流学说的演绎方法，以效用价值论反对古典经济学的成本价值论（张素民，1934）。

18世纪至19世纪前期，美国依旧是一个农业国家。第一次工业革命从欧

洲传播到美国后，仰赖于广袤的国土蕴含丰富的资源，美国工业在19世纪下半期迅速发展。美国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问题，涉及税负、交通、托拉斯、劳工、侨民、税制、公共财政等方面。1885年，美国经济学会成立，推动了经济学者运用经济学理论对经济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大量的经济学著作先后问世，经济学研究机构也陆续出现。受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濡染的经济学者并没有照搬欧洲的经济学说，他们对以往的经济学说加以改造，形成了美国本土化的理论成果。一些留德归国的学者将晚期历史学派的方法和理论与美国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制度学派。如制度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C. Mitchell）以统计技术作为基础，注重从经验分析中归纳出原理（Homen, 1934）。20世纪中期，随着制度学派衰落，美国经济学多元时代终结（张林、徐颖莉，2010）。

18世纪之后，欧美地区的很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围绕社会经济规律进行了探索，他们的探索方式因时、因地而异，如19世纪前期，德国偏重经济史、英国关注纯粹经济学理论、法国注重经济学说史等（萧纯棉，1925），但他们却共同实现了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知识性累积。在经济学理论与方法日臻完善的同时，经济学学科教育陆续步入正轨。19世纪20年代，欧美国家的少数高校开始设立政治经济学教授讲席。此后，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性得到更广泛的认可，相关课程讲义也被其他国家的教育机构采用。19世纪后期，经济学研究逐渐职业化，经济学专业杂志也陆续创办，这都极大地便利了经济科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基于上述梳理可以看出，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前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分析方法在欧美国家逐渐系统化、专门化，同期的中国经济思想未曾发生此种演进态势。《国富论》被部分学者视为欧美经济学说科学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后来所谓的“正统经济学”大多是在《国富论》界定的基本理论与分析方法范畴内拓展的，所以演绎成为“正统经济学”采用的重要分析方法。《国富论》完成于工场手工业时期，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古典经济学由西欧传播到了世界上其他地区，但此后的“正统经济学”长期着重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的相关经济问题。在此期间，历史学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不仅拓展了经济学适用的社会历史情境，还分别为经济学引入了历史分析、阶级分析、制度分析等方法，丰富了经济分析方法。20世纪前期，古典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学说、边际效用学说、社会主



义学说、制度学派理论等都曾被中国学者介绍，其中斯密经济学说、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李斯特国家主义经济学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宏观经济理论等较有影响，这些学说培养了国人的经济科学意识，也影响了中国学者对本土传统经济思想的学理化建构。

## 二、经济科学范式下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解构概略

### （一）传统经济思想学科化构建意识的兴起

中国古代长期“以农立国”，农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经济思想主要依附的经济基础是农业经济，因此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数千年内没有发生重大的变迁，关于生产、消费、交换、分配等问题的讨论持续停留在前科学阶段，未能像西方经济思想那样在18世纪中后期演进成为经济科学。近代以后，外来的工业文明冲击了本土的农业文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依附的经济基础从根本上动摇了（李大钊，1920）。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不断从中国攫取经济利益，中国的自然经济日益瓦解，并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一些士人主张学习西方的富国强兵之术，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并对原有的经济政策、价值观念进行反思，由此形成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潮。向西方学习、重视商业发展、鼓励私营等经济思想被洋务派、改良派、革命派等继承，并不断被赋予新的涵义。

外来经济科学的输入满足了中国近代对新经济思想的理论需求。随着向西方学习的不断深入，个别教育机构效仿欧美高校开设了经济学课程。不同时期的欧美经济学说传播到中国后，曾被译为生计学、平准学、计学、经济学等各异的名称。19世纪70年代早期，京师同文馆开设课程“富国策”，这是中国最早开设“经济学”课程的机构。该课程教习丁韪良选用了亨利·福西特（Henry Fawcett）的英文教材。福西特的著作（*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直译为《政治经济学指南》）汉译本于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出版（叶坦，1998）。后来，更多的经济学通俗著作被译为中文。总体上看，当时流传的外来经济学说多是经济学常识，较少探讨经济学理论层面的问题。直到19世纪末严复等知识分子关注外来经济学说以后，传统经济思想从意识

领域逐渐被摒弃，中国经济思想由于外来经济学说的融入初步具备了经济分析特征（郑学稼，1935；赵晓雷，2016：162）。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成为中国最盛行的科学，其时兴程度超过了“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和哲学（张素民，1939）。

从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看，新的经济思想形成过程中，旧的经济思想通常会受到其时思想家更多的关注。清末士人对传统经济思想的质疑、抨击，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新经济思想的需求。这是清末士人检讨传统经济思想的内因。<sup>①</sup>然而，局限于传统经济思想条框下的“内省”并不能使经济思想产生推动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范式变革，外来经济科学为传统经济思想转型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经济科学的输入是推动20世纪前期知识分子关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外因。经济学自社会科学中分立后，经济思想才被视为经济科学的学术研究对象。换句话说，人们需要从经济思想史中了解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演进历程。<sup>②</sup>

借助经济科学解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前提是中国是否存在与国外类似的经济思想。对于这个问题，直到20世纪40年代学界仍然不乏质疑之声（程国勋，1946）。系列带有鲜明经济科学色彩的成果问世说明了中国存在经济思想，只是由于民族特性、自然环境、历史沿革不同，有其自身独有的呈现方式（唐庆增，1933；高元，1918）。比如，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学说体系所用的名词术语、分析方法有别。近代学者认为，一定的经济现象是中西方社会共有的，二者在描述客观经济问题方面有类似之处。故而，通行于经济学其他方向的理论、方法，都可以应用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李鼎声，1932）。近代有相当多的中外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学说在学理和分析方法上具有可通约性。该时期产生的解释中、欧经济思想二者不同衍革观点，显然是在具备了比较的参照体——经济科学意识——之后才能形成的话题。

① 即使没有外来经济学说的输入，中国同样有可能产生新的经济思想，但这种经济思想可能未必具有经济科学属性。

② 作为经济学的子学科，经济思想史大抵由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一是与经济思想相关的哲学思想，二是关于各种经济问题的见解、主张和政策方案，三是对各种经济现象和问题的理论分析（巫宝三，1991）。

## （二）20 世纪 50 年代前中国经济思想史著述概况

自 20 世纪初期开始，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陆续问世。20 世纪上半期，出版中文著作 20 余部，发表中文论文愈 200 篇，它们大多发表于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见图 1。<sup>①</sup> 在这些著述中，研究先秦时期、民国时期、西汉至清代的作品分别约占三分之一、六分之一、六分之一，史略类、中西比较类的成果各自约占四分之一、十二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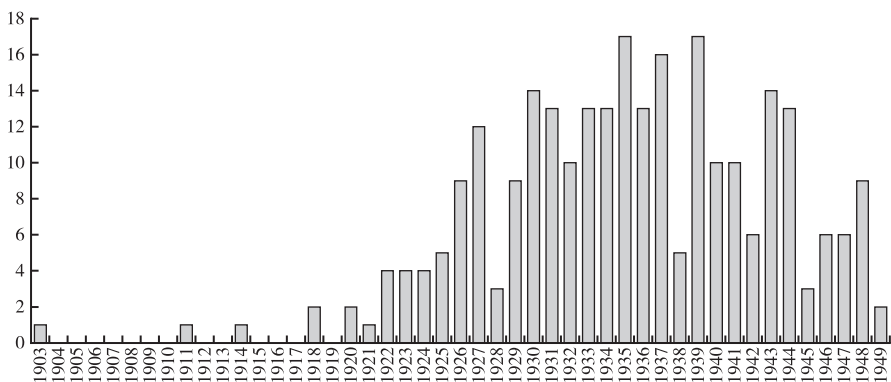


图 1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经济思想史论著统计

资料来源：（1）全国报刊索引，（2）谈敏（1995）。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述体系，中国近代的大多研究者主张采用“四分法”。<sup>②</sup> 由于所持观点不同，他们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排序也有差异，

① 国外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撰写了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的不少著述，田崎仁义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小岛祐马的《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也被译为中文（叶坦，2003）。

② 1767 年，晚期重商主义者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D. Steuart）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这本书在英国产生了较大影响。斯密并不赞同这本书中的观点，但《国富论》延续了重商主义对国民财富累积问题的关注，界定了以国民财富为核心的经济学研究范围。斯密之后，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等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明确。1821 年，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在《政治经济学要义》中将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领域。詹姆斯·穆勒的经济学“四分法”对经济学发展有着深刻影响。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中国经济学界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等主张，甚至也有人主张“生产一元论”。

而中国近代学者对该问题的关注,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学研究已然落后于欧美经济学的现实。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早期成果参考了经济学“四分法”,不过对于近代学者而言,经济学“四分法”是他们整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四个分类主题。从相关著述的研究内容来看,近代学者对生产方面的土地思想与劳动分工思想、分配方面的财政思想、交换方面的货币思想进行了着重梳理,见表1。具体来说,包括历代的财政思想、先秦诸子谈及的分工思想、西汉至清代的土地与货币等方面的经济思想,这些经济思想是对应时期经济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

表1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涉及的经济科学领域<sup>①</sup>

|          |      | 生产 |    |    | 分配 |    | 交换 |    | 消费 |    |
|----------|------|----|----|----|----|----|----|----|----|----|
|          |      | 土地 | 劳力 |    | 资本 | 财政 | 其他 | 货币 |    | 其他 |
|          |      |    | 分工 | 其他 |    |    |    |    |    |    |
| 春秋<br>战国 | 孔子   |    | √  |    |    | √  | √  |    |    | √  |
|          | 孟子   | √  | √  | √  |    | √  | √  | √  | √  | √  |
|          | 荀子   | √  | √  |    |    | √  | √  |    |    | √  |
|          | 《管子》 | √  | √  |    |    | √  | √  | √  | √  |    |
|          | 商鞅   | √  | √  | √  |    | √  |    |    | √  |    |
|          | 韩非   |    | √  |    |    |    | √  |    |    |    |
|          | 墨子   |    | √  | √  |    |    |    | √  | √  | √  |
|          | 许行   |    | √  |    |    |    |    |    | √  | √  |
|          | 道家   |    | √  |    |    |    |    |    |    | √  |
| 西汉       | 司马迁  |    | √  |    |    |    |    |    | √  |    |
|          | 贾谊   |    |    | √  |    | √  |    |    |    |    |
| 唐代       | 刘晏   |    |    | √  |    | √  | √  | √  |    | √  |
|          | 杨炎   | √  |    |    |    | √  |    |    |    |    |
|          | 陆贽   |    |    |    |    | √  |    | √  |    |    |
| 北宋       | 王安石  | √  |    |    | √  | √  | √  | √  | √  |    |

<sup>①</sup> 民国时期孙中山的民生经济思想融合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欧美地区经济科学的理论要素,涉及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领域的社会经济问题(熊金武,2020)。孙中山的民生经济思想是中西方经济思想融汇的理论成果,但与本文所关注的近代学者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经济科学化构建不同。

续表

|          |     | 生产 |    |    |    | 分配 |    | 交换 |    | 消费 |
|----------|-----|----|----|----|----|----|----|----|----|----|
|          |     | 土地 | 劳力 |    | 资本 | 财政 | 其他 | 货币 | 其他 |    |
|          |     |    | 分工 | 其他 |    |    |    |    |    |    |
| 明末<br>清初 | 黄宗羲 | √  | √  |    |    | √  |    | √  |    |    |
|          | 顾炎武 | √  | √  |    | √  | √  | √  | √  | √  | √  |
|          | 王夫之 | √  |    | √  |    | √  | √  | √  |    |    |
| 清代       | 孙鼎臣 | √  |    | √  |    | √  | √  | √  | √  |    |
|          | 龚自珍 | √  |    | √  |    | √  |    | √  |    |    |
|          | 曾国藩 | √  |    |    |    | √  |    | √  | √  |    |
|          | 严复  |    |    |    |    |    | √  |    | √  |    |

资料来源：根据近代文献中关注度较高的经济思想整理得到。

从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著述的选题来看，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思想是其研究重点领域。如甘乃光著作了《先秦经济思想史》，他指出汉代以后的经济思想只是先秦经济思想的余绪（甘乃光，1926：2）。而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仅付梓了先秦部分。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林立，“九流”“十家”的论说是近代学者整理该时期经济思想的主要线索。<sup>①</sup>

中、西方经济思想史中类似的观点是近代著述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如货币数量论。<sup>②</sup> 麦英甫认为，《管子》中的货币数量论早于西方国家同类经济学说千余年，对贾谊、陆贽、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王鏊、许楣等的观

①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大变革，百家争鸣而兴诸子之学。战国至西汉时期，诸子思想逐渐得到概括与总结。《荀子·非十二子》《庄子·天下》分别列举了部分思想家的名字。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列出了儒、道、名、墨、法、阴阳六家，刘歆的《七略》在《论六家要旨》的基础上增加了纵横、杂、农、小说四家，计为十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至此，“九流”之说别于“十家”。

② 1576年，法国重商主义者博丹在《国家六论》中论及了货币数量论。后来，孟德斯鸠（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休谟、李嘉图、约翰·穆勒等人都提到了类似的货币数量论观点。20世纪初，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以“交易方程式”表述货币数量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和阿瑟·庇古（Arthur C. Pigou）二人则用“剑桥方程式”进行了表述。1956年，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结合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以一个多元函数方程式重新表述了货币数量说。

点产生了影响（麦英甫，1937）。相较于货币数量论在欧美经济学说中的发展，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货币数量论虽然产生时间更早，但其后来的延续多是反刍式的，并没有在理论范畴领域实现扩展，也未能在分析方法方面产生重大变革。

表2 近代学者整理的中西方经济思想中类似的部分观点

| 欧美经济学说                       | 例证  |
|------------------------------|---|
| 斯密分工论                        | “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 <sup>1</sup>                      |
| 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的财政再分配论 | “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 <sup>2</sup>                          |
| 价值决定价格                       | “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sup>3</sup>  |
| 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                  | “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 <sup>4</sup>                           |
| 贵金属非财富                       | “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 <sup>5</sup>                                   |
|                              | “倚银而富国，是恃酒而充饥也。” <sup>6</sup>                                     |
| 劣币驱逐良币论                      | “今之钱则下而不上，伪钱之所以日售，而制钱日壅，未必不由此也。” <sup>7</sup>                     |
| 货币数量论                        | “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 <sup>8</sup>                                 |
| 货币功能                         | “古人制币，以权百货之轻重。” <sup>9</sup>                                      |
| 斯密放任主张                       |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sup>10</sup>                   |
| 适度放任兼干涉主张                    | “上收铜勿令布，则民不铸钱……铜毕归于上，上挾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 <sup>11</sup> |

资料来源：根据近代部分中国经济思想文献整理得到。

注：1. 吴毓江：《墨子校注》卷之11《耕柱》第46，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56页。

2. [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第18《六反》第46，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22页。

3. [清]阮元：《十三经注疏》13《孟子注疏》卷第5下，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886页。

4. [清]阮元：《十三经注疏》13《孟子注疏》卷第6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897页。

5. [清]马骥：《绎史》卷44《春秋》第14《齐桓公霸业》，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126页。

6. [清]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之1《钱粮论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页。
7. [清]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之6《钱法论》，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7页。
8. [明] 刘绩：《管子补注》卷之22《国蓄》第73，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438页。
9. [清]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12《财用》，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535页。
10. [清] 马驥：《绎史》卷157《外录》第7《食货志》，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071—4072页。
11. [汉] 贾谊：《谏放民私铸疏》，载[清] 曾国藩：《经史百家杂抄》卷11《奏议》之属一，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01页。

欧美学界关注的相关问题也得到了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的呼应。边际效用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曾围绕“斯密问题”的产生有过争论。从“斯密问题”中引申出的话题是，斯密的经济思想是否受到了重农学派学说的影响。而重农学派的学说被一些学者认为受到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先后有李永霖（1922）、李光忠（1928）、袁问不（1930）、李肇义（1937）、马寅初（1937）、朱谦之（1940）、熊子骏（1942）等论证或提及了法国重农学派的重农思想源自中国的观点。<sup>①</sup>较之于国外学者关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对欧洲文化影响的论证，中国近代学者对该问题的关注从心态上来说可能更为复杂。当然，考察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也是近代知识分子诠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经济科学学理关联的另一种表现。

近代学者对传统经济思想的解读也并非全然正确。相关误读主要分为两种，一是知识性的，二是常识性的。前者如个别学者把《孟子·万章下》中“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误解为古典经济学者提出的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于继平，1931）。《孟子·万章下》中的记载实际上是通过示例说明不同务农者之间在生产水平方面存在差异。近代学者

① 李永霖（1922）提及的《富之生产及分配的考察》即谈敏（1992：90—98）著作中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李肇义（1937）这篇论文系李肇义于1936年在法国第戎大学留学时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的节选。马寅初（1937）此说系援引自唐庆增（1936）。

对传统经济思想的经济科学化解读存在一些常识性误读,如将老子的“无为论”等同于斯密的放任主张(丁同力,1930)。事实上,老子的“无为论”与斯密放任主张的产生历史背景及思想旨趣并不相同。春秋末期,各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斗争,造成了社会的混乱;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社会秩序,老子提出了“无为论”。斯密生活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前期,重商主义政策及封建经济组织束缚了经济的发展,制约了社会总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斯密主张竞争性的市场运行方式。

欧洲中世纪的经济思想受到宗教伦理严重影响,随着重商主义的兴起,欧洲经济思想的经济伦理色彩趋于浓厚。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多带有社会伦理色彩,在先秦时期的经济思想中以儒家最为突出(徐学武,1935)。儒家经济思想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影响最深,它强调通过遵循既定的道德准则维持社会经济秩序。所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可以说规范分析特征鲜明。正因如此,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一度被个别国外学者诟病为缺乏分析性。从近代学者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经济科学化构建不难看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并不缺乏分析性,而只是在演进过程中未能形成与欧美经济科学类似的“科学化”的分析手段。事实上,在中国古代部分经济思想文献中,关于租税、富国、分工、交换等问题的讨论呈现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分析特征(巫宝三,1992)。唐庆增等人试图通过科学改造传统经济思想,实现孕育本土经济学和指导经济建设的目的,但事实上他们仅仅梳理出了一些具有经济科学成分的传统经济思想,并未能从中归纳出一般化的经济理论(唐庆增,1930;汪育春,1924)。

### (三)《孔门理财学》——传统经济思想的学科化构建先声之作

《孔门理财学》的作者陈焕章早年师从康有为,受到康氏今文经学思想的影响。1911年,陈焕章以“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一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次年,陈焕章(1912)将其博士学位论文名称汉译为“孔门理财学”。胡寄窗认为,《孔门理财学》准确汉译名应为“孔子及学派的经济原理”(胡寄窗,1984:476)。笔者认为,如果按照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通行的译法,该著作的汉译名或许是“孔子及其门徒的经济原论”,现代的译法可以为“孔子及其拥趸的经济学原理”。《孔门理财学》中的“理财”一词来自《周易·系辞》,其英文的对应词是“Economics”,相



较于具有政治学意味的“经济”，陈焕章认为“理财”更为准确（陈焕章，1912；陈焕章，2015：42—43）。

《孔门理财学》分为5部、10篇（含结论），其内容架构与当时通行的经济学著作无甚区别。陈焕章在该书第一部“通论”中分析了儒家学说对诸子学说及后世的影响，指出孔子首先不是一位理财家而是一位全面的哲学家，并指出理财学是社会学、宗教学、政治学、伦理学的基础。该书第一部第三篇“理财通义”是全书理论概述，陈焕章借用社会进化论从宏观（天下）、微观（家庭）角度梳理理财学在中国古代的发展，展示了儒家学说中政府干预和自由放任两种政策，并吸收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的经济学“二分法”观点将儒家学说划分为生产与消费两部分论述。

表3 《孔门理财学》的内容架构

| 部类    | 篇章   |
|-------|--|
| 部甲 通论 | 第一篇 孔子及孔门(孔子历史、孔子精义、孔子及其徒之著作、孔教源流)                   |
|       | 第二篇 泛论理财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泛论理财学与各科学、理财学与社会学、理财学与政治学、理财学与伦理学) |
|       | 第三篇 理财通义(理财为进化之母、理财之机体、理财政策及理财学之分部)                  |
| 部乙 消费 | 第四篇 消费(消费通义、贫富皆有乐地、乐生之道、支出之普通标准、特别支出)                |
| 部丙 生产 | 第五篇 生产要素(生产之三要素、人口、天然物及资本)                           |
|       | 第六篇 生产事业(泛论生产事业、论农、论工、论商)                            |
|       | 第七篇 分配(分配通义并论租论息及利、论庸)                               |
|       | 第八篇 社会政策(井田、专利、食禄者不得争利、调剂供求、谷政、借贷及赈恤)                |
| 部丁 财政 | 第九篇 财政(国用、赋税通义、直接税、间接税)                              |
| 部戊 结论 | 结论   |

资料来源：陈焕章（2015）。

《孔门理财学》对生产思想的论述所占篇幅最多，并将分配纳入生产领域。陈焕章将生产要素分为劳动力、土地等天然生产资料、资本三类，并以四民为基础将生产部门划分为农业、手工业、商业。农业生产领域中《韩诗外传》与叶适等提及了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理念，手工业生产领域中《考工记》《书经》《论语》论及了生产技术的重要性，商品交易领域中介绍了孟子关于价值和价格的认识、单旗提出的货币数量论、叶适发现的格雷欣法则等。

此外，陈焕章设专部探讨了财政问题。

在结论中，陈焕章指出中国理财活动停滞不前的原因有：一是孔子教导人们的理财动机要受制于道德动机，二是中国思想文化更关注精神层面而轻视物质追求，三是科举取士扭曲了教育制度，四是社会阶层结构不合理，五是交通运输体制的落后及封建政府的不当经济干预，六是经济体制方面的约束（陈焕章，2015：570—574）。

结合该书的序言、全书的内容和陈焕章归国后的表现来看，《孔门理财学》的著作目的不是宣传经济学，而是呈现孔子及其拥趸的经济思想。正如陈焕章在结论中论及的那样，《孔门理财学》并非盲目吹捧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主张在保持自己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接纳外来思想。

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采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构传统经济思想不同，《孔门理财学》的主体论述架构是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也少量使用到了社会主义学说、新古典经济学、阶级分析、制度分析等理论与方法。陈焕章还对孔子的分析方法进行了简要的归纳。陈氏认为，孔子用了推理与归纳的方法，但孔子更倾向于归纳方法（陈焕章，2015：26）。《孔门理财学》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陈焕章认为亨利·乔治（Henry George）主张没收地主的土地、在孔子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政体已经是帝国民主制等等（陈焕章，2015：416、77）。《孔门理财学》中也多次使用“社会主义”来概括相关的思想与政策，只是陈焕章对社会主义学说的认识未达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深度。

尽管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乏与欧美经济科学类似的观点，但这些思想通常是零散的，并未成系统化的体系。《孔门理财学》的问世表明，借助经济科学理论分析要素，对传统经济思想中笼统的主张予以精深的研究是可行的（唐庆增，1930）。虽然《孔门理财学》的英文版本可能受到了当时中国学者的关注，但近代时期关于《孔门理财学》的中文著述并不多。<sup>①</sup>实际上，后来关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学科化解构成果呈现的一些问题，《孔门理财学》已经涉及了，可以说《孔门理财学》为此后同类问题的研究开启了先河。

<sup>①</sup> 较之于国内，《孔门理财学》在海外引起的学术反响更大。

### 三、对当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启示

近年来，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经济学界进行了大量论证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也就是形成经济学的中国学派（洪银兴，2019）。习近平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相关讲话，从理论和方法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三种资源（习近平，2016）。与之相呼应的是，部分从事现代经济理论问题的研究者强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加强经济思想史的学习，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与西方经济学说史、中国经济思想史与国外经济思想史的比较（洪永淼，2020）。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最具有本土特色的经济理论基础要素。从内容构成方面说，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理所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中国经济思想的指导思想，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推了解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系列成果。中国经济思想是不断发展的经济思想，其演进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思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的科学化探索，对当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首先，坚持以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锻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土特色。科学性不单是经济思想与经济学理论的分界线，也是判断中国特色经济理论是否具有创新价值的标准之一。近代学者对传统经济思想的解读与重构，不仅采用了外来的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还结合资料的特点采用了传统文化观念与学术研究方法。这些理论与方法较好地契合了传统经济思想的特点，涌现出了系列传统经济思想科学化的成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创立奠定了基础。然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有其形成的独特环境，这造成了部分著述对传统经济思想的解读存在观点跳跃或逻辑矛盾（钟祥财，2010）。为了避免此类状况的发生，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在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指导下，结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于其原本形成和发展路径中去凝练和解构，使其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

其次，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化理论的实用性。重商主义、重农主义、斯密学说、历史学派等经济思想皆是根植于社会经济发展现实需求而产生的经济学说。在西欧各国主要国家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无产阶级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已经登上历史舞台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综合当时人类优秀成果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国近代学者整理传统经济思想，除了推动本土化经济科学的产生，更重要的是为了解决当时面临的社会问题（唐庆增，1935）。偏重于论述实际问题而忽视一般化理论的总结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时期式微的原因。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形成实用性的一般化理论以保持其理论活力。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在推进经济学理论完善方面发挥作用。自18世纪末欧美地区经济学科学化发展以来，各个学派秉持的范式与方法对提高经济学解释力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经济学在近代传播到中国后，国人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与关注受到了外来经济学说的极大影响，中国经济思想史从此演变为世界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思想的汇流（李权时，1924；熊子骏，1942）。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着力将传统经济思想科学化的目的之一是为经济学的发展贡献中国元素（胡寄窗，1984：484）。解构和重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重点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则指导下，通过具体的理论诠释形成受到更广范围认可的经济理论。

### 参考文献：

- 陈焕章，1912，《孔门理财学之旨趣（寰球学生会之演说稿）》，《萃报》第1期。
- 陈焕章，2015，《孔门理财学》，韩华译，商务印书馆。
- 程国勋，1946，《中西经济思想的差异》，《励行月刊》第1期。
- 程霖、张申、陈旭东，2018，《选择与创新：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近代考察》，《经济研究》第7期。
- 丁同力，1930，《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研究》（下），《社会科学杂志（上海）》第4期。
- 甘乃光，1920，《经济思想活动中心之迁移》，《东方杂志》第7期。

- 甘乃光, 1926, 《先秦经济思想史》, 商务印书馆。
- 高元, 1918, 《周秦学者之经济思想》, 《法政学报(北京1918)》第4期。
- 韩讷, 1926, 《经济思想史》, 臧启芳译, 商务印书馆。
- Homen, 1934, 《米琪尔之经济思想(待续)》, 文若译, 《经济学月刊》第4期。
- 洪银兴, 2019, 《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 《政治经济学报》第1期。
- 洪永森, 2020, 《构建中国经济学笔谈·中国经济学的独创性与一般性》, 《经济学动态》第7期。
- 胡寄窗, 1984,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胡寄窗, 1988, 《政治经济学前史》, 辽宁人民出版社。
- 孔庆宗, 1921, 《史记货殖列传在我国古代经济思想上之价值》, 《重庆中校旅外同学总会会报》第3期。
- 兰德雷斯, 哈里、大卫·C. 柯南德尔, 2014, 《经济思想史》, 周文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 李炳煊, 1934, 《经济思想的背景》, 《经济学期刊》第2期。
- 李大钊, 1920,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新青年》第2期。
- 李鼎声, 1932, 《现代学生与经济思想》, 《现代学生(上海1930)》第1期。
- 李光忠, 1928, 《法国重农学派与中国政治经济思想之关系》, 《法科丛刊》第1期。
- 李权时, 1924, 《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思想》, 《东方杂志》第1期。
- 李森林, 1935, 《上古及中古时代的价值思想》, 《经济丛刊》第3期。
- 李永霖, 1922, 《经济学者杜尔克Turgot与中国两青年学者之关系》, 《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1期。
- 李肇义, 1937, 《重农学派受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思想影响之考证》, 《社会研究》第3期。
- 马寅初, 1937, 《经济思想随社会环境变迁之程序》, 《东方杂志》第1期。
- 麦英甫, 1937, 《管子经济思想研究》, 《经济丛刊》第7期。
- 塞利格曼, 1934, 《经济思想之史的发展》, 范奔公译, 《汉口商业月刊》第9期。
- 谈敏, 1992, 《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 上海人民出版社。
- 谈敏主编, 1995, 《中国经济学图书目录(1900—1949年)》,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唐庆增, 1930, 《中国经济思想之改造》, 《商学月刊(上海)》第4期。
- 唐庆增, 1933, 《中国经济思想之特点》, 《经济学月刊》第1期。
- 唐庆增, 1935, 《中国经济思想四大潮流》, 《光华大学半月刊》第7期。
- 唐庆增, 1936, 《中国经济思想史》(上), 商务印书馆。
- 汪育春, 1924, 《怎样去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 《商学》第37期。
- 王海波, 1932,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 《经济学季刊》第2期。
- 魏建, 1999, 《德国历史学派兴衰述评》, 《经济科学》第2期。
- 巫宝三, 1982, 《谈谈研究中国早期经济思想的意义、现状和前景》, 《经济研究》第8期。

- 巫宝三, 1991, 《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主要方面及其意义》, 《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
- 巫宝三, 1992, 《中国古代经济分析论著述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1期。
- 习近平, 2016,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光明日报》5月19日。
- 萧纯棉, 1925, 《治经济思想史发凡》, 《科学》第1期。
- 萧伟信, 1932, 《历史学派之经济思想》, 《社会科学论丛》第1期。
- 熊金武, 2020, 《近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研究——以民生经济学为例(1840—194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熊子骏, 1942, 《中西经济思想之汇流》, 《大学(成都)》第11期。
- 徐学武, 1935,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质》, 《青年(杭州)》第11期。
- 杨春学, 2019, 《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境遇: 一种历史的考察》, 《经济学动态》第10期。
- 叶坦, 1998, 《“中国经济学”寻根》, 《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叶坦, 2003, 《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考察——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与发展优势论析》, 《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
- 于继平, 1931, 《孟子经济思想之分析(续完)》, 《经济周刊》第54期。
- 袁问不, 1930, 《我们对于西洋经济思想的供献》, 《商学季刊(上海)》第4期。
- 张林、徐颖莉, 2010, 《美国本土经济学的多元时代及其终结》, 《经济学动态》第12期。
- 张素民, 1934, 《正统派经济思想之成立及其影响》, 《前途》第9期。
- 张素民, 1939, 《现代中国经济思想界》, 《自修》第56期。
- 赵靖主编, 2002,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 赵靖、张鸿翼、郑学益, 1984,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回顾》, 《经济科学》第3期。
- 赵晓雷, 2005, 《经济思想史学科界定及研究方法的技术性要求》, 《经济学家》第3期。
- 赵晓雷主编, 2016, 《中国经济思想史》,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 郑学稼, 1935, 《严侯官先生的政治经济思想》, 《史地社会论文摘要月刊》第1期。
- 钟祥财, 2010, 《中国近代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方法论特点: 以梁启超为例》, 《财经研究》第8期。
- 朱谦之, 1940, 《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 商务印书馆。
- 朱绍文, 2010, 《亚当·斯密的〈道德感情论〉与所谓“斯密问题”》, 《经济学动态》第7期。
- 邹进文, 2010, 《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Economic Thought in Modern China

*Miao Dega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economics developed into a systematic economic science in Europe, while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was still in the pre-scientific stage. After the mid – 19th century,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production and culture of China were impacted by west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With the spread of foreign academic thoughts,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times deconstructed economic thoughts from Chinese ideology and culture with reference to the economic science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s. These attempts may be preliminary, but the economic scientiz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economic thoughts in modern times promoted the localize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research, which can be said to be an epitome of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xploring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economic thought in modern economics can provide helpful enlightenmen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Traditional Economic Thought, Economic Theory, Economic Thought of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JEL Classification:** A13, B10, B40

(责任编辑: 倪诗妆)